

数字智能时代社会基本单元的重构与文明形态演进研究

陈正兴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1

摘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了社会基本单元的形态演变始终受制于物质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变革。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系统考察从血缘氏族、农耕宗族到工业核心家庭的功能捆绑结构及其解体逻辑，并首次提出“伟大的解绑定”（The Great Unbundling）这一核心范畴，用以刻画数字智能时代社会联结方式的深层转型：个体从传统单元捆绑式供给的经济合作、情感支持与价值认同中“脱嵌”，转而由多元、异质、自主择定的选择性社群分别满足不同维度的需求。这一转型并非单纯的社交方式变迁，而是文明底层逻辑的根本重构——联结原则从血缘、地缘的先天给定转向趣缘、价值观的后天认同，个体首次真正成为社会网络的自主节点。然而，“个体的崛起”既释放了空前的自由，也带来了意义迷失、责任重负与优绩主义陷阱。文章进一步剖析当代中国“国家主导下的个体崛起”与“个体激活下的集体重构”双向运动，以经济普查、社区治理与数字素养调查等实证数据，论证个体与集体相互赋能的循环上升逻辑，阐明从“必然的集体”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性中间环节。本文致力于为理解数字时代社会基本单元的重构提供一种兼具理论原创性与现实解释力的社会哲学分析框架。

关键词 社会基本单元；伟大的解绑定；文明转型；个体与集体；自由人联合体

Abstract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reveals that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fundamental social units has always been conditioned by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aking this as its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functional “bundling” structures and their dissolution from blood-based clans, agrarian lineages, to industrial nuclear families. It introduc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Great Unbundling” to capture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bond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individuals are “disembedded” from the bundled provis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emotional support,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by traditional units, and

Received: January 24, 2026

Revised: February 12,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5, 2026

Published: March 7,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re-embedded” into multiple, heterogeneous, self-selected communities that fulfill distinct dimensions of need.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merely a change in modes of social interaction, but a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 of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ivilization—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social ties shifts from ascriptive bonds of blood and geography to achieved affinities of interest and values, marking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individuals have become truly autonomous nodes within the social network. However, this “rise of the individual” brings not only unprecedented freedom but also a loss of meaning,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itfalls of meritocracy.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dual movement of “state-led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nd “individual-activated collective r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drawing on empirical data from economic censuses,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igital literacy surveys to demonstrate a spiral of mutual empowerment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It elucidates a historical intermediate phase on the path from the “necessary collective” toward the “free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socio-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f both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fundamental social units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Fundamental Social Unit ; The Great Unbundling ;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Free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1. 引言

当今世界，数字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社会形态。互联网从信息互联迈向价值互联与智能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具备了全域实时连接、海量数据处理与算法理性决策的技术能力^[1]。泛在网络的普及使“在线”成为日常存在的默认模式，从社交互动到劳动协作、从公共参与到价值认同，数字技术正重新定义“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一社会哲学的核心命题^[2]。

在这一时代语境下，社会基本单元的重构已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是关乎社会整合、个体福祉与文明走向的紧迫现实议题。传统单元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以地缘为边界的社区、以业缘为依托的职业共同体功能持续弱化：教育被学校接管，养老转移至社会保障，情感与身份认同的垄断地位被多元社群分享^[3]；社区从熟人社会退化为地理单元，整合能力日益萎缩^[4]。与此同时，新兴社群虽蓬勃生长，却呈现高度异质性、流动性与非制度化特征：线上社群可一夜聚合亦可迅速沉寂，虚拟共同体能提供归属却缺乏信任根基与冲突解决机制^[5]。传统纽带弱化与新兴纽带未稳并存，使个体陷入结构性归属困境：既渴望从僵化单元中解放，又难以在流动现代性中锚定稳定自我。更需警惕的是，数字平台在赋能自主选择的同时，通过算法推荐、社交评分与行为预测构筑新型社会控制个体看似自由切换社群，实则嵌套于平台资本主义逻辑之内^[2]。因此，社会基本单元重构绝非技术演进的自然副产物，而是亟需理论审视、历史定位与实践介入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所论“社会基本单元”，特指在特定历史阶段同时承担三重核心功能、并构成个体与社会首要中介环节的组织形态：第一，作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构成单位，经济合作、财产占有与代际传承的组织化场域；第二，作为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核心承载载体，身份定义、价值确认与情感依托的首要共同体；第三，作为权利享有与义务履行的核心承载主体，社会规范、道德责任与制度性权利配置落实的基本单位。上述三重功能在历史演进中并非分离，而是以高度“捆绑”形态凝聚于同一单元之内：史前氏族的共产制经济、血缘认同与部落规范三位一体^[3]；农耕宗族的土地经营、祖先崇拜与宗法秩序相互缠绕^[4]；工业核心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情感私密化与私有财产继承彼此支撑^[3,6]。正是这种功能捆绑结构赋予社会基本单元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稳定性，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石。

本文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使用“文明转型”“文明底层逻辑”等术语。“文明转型”特指社会基本单元的构成原则、功能配置与合法性基础发生的根本性、不可逆的结构变迁，其核心维度包括：联结方式从血缘、地缘的先天给定，经业缘、契约的制度嵌入，向趣缘、价值观认同的后天选择演进；个体地位从被集体完全吸纳的“部件化存在”转向穿梭于多元社群的“节点化存在”；集体合法性从“个体为集体而存在”的先天叙事转向“集体为个体而赋能”的后天论证。“文明底层逻辑”则指支撑特定单元形态的生产力基础、资源分配方式与正当性论证的深层编码。这一界定旨在将宏大叙事锚定于具体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使后文论述具备明确的维度可循与制度形态可征。

基于上述界定，本文核心研究目的为：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考察社会基本单元演变历程，揭示物质生产方式跃迁如何推动单元形态从封闭、强制、功能捆绑式共同体向开放、选择、功能分化式社群辩证转型^[3]；并聚焦数字智能时代单元重构的核心机制，即本文首次系统阐释并命名的“伟大的解绑定”（The Great Unbundling）进程，剖析个体从传统单元捆绑式供给的经济合作、情感支持、价值认同与文化生活中“脱嵌”^[6,7]，转向由多元、异质、自主择定的社群分别满足不同维度需求的“再嵌”模式^[1,2]。本文致力于通过历史发生学追溯与结构功能分析，揭示当代个体，社会关系转型的深层逻辑，为后续理论对话与制度回应提供可检验的解释框架。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第一，理论范式层面，实现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核心命题的当代延伸^[3]。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通过对社会基本

单元三重功能的清晰界定及其捆绑，解绑，再嵌逻辑的提炼，建构“单元功能捆绑，功能解绑，个体节点化，选择性再嵌”四阶段演进模型，将经典分析框架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延伸至数字文明阶段，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释边界。

第二，概念建构层面，首创性提出并系统界定“伟大的解绑定”这一核心范畴。既有研究多从“个体化”“脱嵌”“网络社会”等视角切入当代变迁^[1,6]，但较少聚焦社会基本单元本身的功能结构转型。本文明确指出传统单元的本质特征在于“功能捆绑”^[3,4]，而数字智能时代的技术条件与社会制度使这些功能可被系统性拆解并分别交付不同选择性社群^[2,5]。本文对这一范畴的发生条件、演进路径、当代表征及其内在张力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处理，为理解当代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提供新的分析工具与概念底座。

第三，价值关怀层面，在技术决定论与文化悲观论之间开辟辩证理解路径。一方面拒斥将技术视为社会变迁唯一动因的简化论，始终将数字技术置于物质生产方式演进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强调技术的社会嵌入性与制度中介性^[1,2]；另一方面亦不认同将共同体弱化单纯视为“堕落”或“失范”的保守叙事，而是揭示这一进程中蕴含的人类解放潜能，社会联结方式从血缘、地缘的先天给定转向基于理性选择与情感认同的后天缔结，正是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步骤^[5]。本文通过对社会基本单元三重功能捆绑结构的历时性解构与共时性分析，为思考数字时代的共同体重建提供一种既尊重生产力根本动因、又肯定主体能动空间的理论参照。

综上，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以社会基本单元三重功能捆绑及其历史演变为分析主线，以“伟大的解绑定”为核心解释范畴，力图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形态之间建立一种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关切的理论叙事，为理解数字智能时代人类联结方式的深刻重构贡献系统化的社会哲学阐释。

2. 个体与集体：社会主义的辩证新解，从“必然的集体”到“自由的联合”

将社会基本单元的个体化趋势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初看似乎存在矛盾，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这或许是解开未来社会形态之谜的关键钥匙。恩格斯的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系统性论述，为我们理解这种辩证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然而，要真正把握当代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深层关联，就必须超越静态

的“个体 vs 集体”二元框架，转而揭示二者在历史演进中相互否定、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逻辑。

2.1. 经典理论的终极愿景：“自由人联合体”及其辩证内核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表述的精髓，恰恰在于“自由人”与“联合体”之间那种看似悖论、实则统一的辩证结构。它预设了每一个个体的充分解放和全面发展，并以此作为个体间自愿联合而非强制捆绑的前提；同时，它又强调只有在真正的联合体中，个体才能获得实现自由的手段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他们严厉批判的是那种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如旧式的国家、等级制度、以及异化为统治工具的私有制家庭，在其中，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成员而隶属于共同体，其自由与发展受到先在身份与制度枷锁的刚性束缚。而他们向往的，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

此处必须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个体与集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而是一对互为前提、相互渗透、在历史运动中不断重新配置关系的辩证范畴。个体的解放并非通向原子化的孤岛，而是通向更高级、更自觉、更平等的联合形式；集体的强化也并非必然意味着对个体的压制，关键在于这一集体是“虚假的共同体”还是“真正的共同体”。前者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维持自身的凝固与延续，后者则以个体的全面发展为自身存在的目的与合法性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基本单元演变中呈现出的高度个体化趋势，个体从氏族、宗族、核心家庭等传统单元中不断获得解放，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反而是其高级阶段得以实现的历史性前提。

从本文所界定的“文明转型”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恰恰揭示了文明底层逻辑的根本转换：传统文明中集体的正当性来源于超验秩序或历史惯性，个体只能在集体划定的轨道中完成被指派的生命任务；而未来文明的正当性将来源于集体对个体自由的实质性贡献，集体的存在意义需要在对个体发展的赋能中获得持续辩护。这一规范性重心的位移，正是“从必然的集体到自由的联合”这一命题的深层意涵。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历史的发生学梳理，其理论旨趣正在于揭示这些曾经必然、但终将消亡的旧形式如何产生、如何运转，以及它们为何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联合形式所取代，这本身就是一部文明联结底层逻辑的转型史^[3]。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基本单元演变中呈现出的高度个体化趋势，个体从氏族、宗族、核心家庭等传统

单元中不断获得解放，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反而是其高级阶段得以实现的历史性前提。没有高度发展的、具有独立人格、理性判断与自主选择能力的个体，所谓“自由人联合体”便只能停留于抽象的道德悬设，而无法获得现实的社会载体。

2.2. 历史实践的悖论：集体强化的逻辑与个体在场的缺失

然而，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呈现出一幅远为复杂乃至充满张力的历史图景。为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在严峻的国际地缘环境中维系主权独立与制度安全，绝大多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强组织化的社会动员模式。在这一历史阶段，个体被深度嵌入单位、公社、国营工厂、集体农庄等集体组织之中，其职业选择、生活资料分配、社会流动机会乃至私人生活空间，均高度依赖于所属集体的制度性安排。在这种可被称为“动员式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下，个体的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服务于国家目标、阶级使命与集体荣誉的宏大叙事之中，个体利益与选择自由则在制度设计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处于相对次要乃至需要被“克服”的位置。

这一历史实践的内在悖论在于：它虽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历时数世纪方能实现的工业化积累，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基础设施与国防工业体系，并在教育普及、公共卫生、性别平等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本身恰恰为个体潜能的普遍释放创造了物质与制度前提，但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配置上，却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中那种以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以自愿联合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集体在此阶段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必然的集体”：它并非个体自觉选择与持续缔造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存所必须依附的制度外壳；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认同，而更多地源于生存资源的制度性垄断与流动机会的结构性匮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这一历史悖论的揭示，绝非对社会主义早期实践的全盘否定，而是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特定阶段的集体主义形态放置于其发生的历史条件中加以辩证理解。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时反复强调的：任何社会形式在其产生之初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意义，但同样地，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形式便会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3]。同理，动员型集体主义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强制整合功能，与其在更高发展阶段对个体创造力释放的抑制作用，恰恰是同一历史

进程的两面。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命题，正是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将“必然的集体”辩证地扬弃为“自由的联合”。

2.3. 当代中国的新型辩证关系：个体崛起与集体重构的循环赋能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尝试破解这一跨越世纪的历史悖论。这一实践的理论原创性与历史贡献在于：它既不认同新自由主义将个体解放等同于国家退场、市场万能的简化论叙事，也不退回前改革时代将集体利益抽象化、绝对化并以之压制个体正当权益的传统模式；而是在生产力持续跃升、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背景下，探索一种个体与集体相互赋能、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效率与公平循环促进的新型辩证关系。

这一新型关系的核心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主导下的个体崛起”与“个体激活下的集体重构”双向运动。一方面，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权力交还市场，通过法治建设系统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契约自由与人格尊严，通过科技创新政策与创业扶持机制为个体才能的外化开辟广阔通道，这正是“国家主导下的个体崛起”维度。数据显示，中国个体工商户已超过 1.1 亿户，带动近 3 亿人就业^[9]，这种微观经济主体的蓬勃生长，绝非自生自发的自然演进结果，而是制度性赋权的产物。另一方面，个体在获得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与流动能力之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预言的那样走向彻底原子化，而是在新的需求驱动与技术条件下，主动发起并深度参与着集体形态的重构进程。从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复兴，到志愿服务组织的规模化成长；从基于趣缘的线上社群，到以社会责任为纽带的公益共同体，个体正在以传统集体时代难以想象的主动姿态，重新创造着“在一起”的方式。这正是“个体激活下的集体重构”维度。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逻辑呈现出清晰的循环上升结构：集体（在此首先体现为制度性、宏观性的国家与法治框架）通过对个体的赋权，使个体获得了从前现代依附或计划指令中解放出来的自主性；自主的个体在新的社会交往场域中，自发或自觉地缔结新型联合体；这些新型联合体的运转实践，反过来对宏观制度提出新的调适需求，推动集体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功能迭代与形态转型。在此循环中，个体并非集体的消解者，而是集体的重构者；集体也并非个体的压制者，而是个体的赋能者。

2.4. 从“必然的集体”到“自由的联合”：辩证运动的逻辑图景

综观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个体与集体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辩证关系提炼为三个层层递进的逻辑环节。

第一环节：否定之否定。传统集体（宗族、封建行会、旧式家庭）以血缘或地缘的先天给定性束缚个体，是第一重“肯定”；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从这些传统集体中“脱嵌”，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自由，是第一重“否定”；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既保留了个体独立性的历史成就，又在自由认同基础上重建联合，是对前一阶段个体孤立状态的“否定之否定”。当代中国的实践正处于从第一重否定向否定之否定过渡的历史方位：个体化进程已充分展开，但新型联合体的制度化、普遍化尚在生成之中。

第二环节：互为前提。个体的真实解放以集体提供物质保障、制度框架与公共产品为前提，没有普惠的教育与医疗、没有公正的司法救济、没有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兜底机制，个体的所谓自由只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集体的可持续存在与健康发展，也以个体的创造力释放与认同性参与为前提，失去个体活力注入的集体，将退化为恩格斯所批判的“虚假的共同体”，徒具形式外壳而丧失生命力源泉。

第三环节：循环上升。个体与集体的辩证运动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平衡，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无限过程。每一轮个体活力的释放，都会催生新型联合的组织需求；每一种新型集体的制度化成熟，又会为下一轮个体发展奠定更高起点的平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个体、集体关系维度的具体呈现。

需要特别辨析的是：当代数字智能时代的个体化与集体重构，并非对传统集体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辩证综合。这一综合的核心特征在于：集体不再以“替代个体决策”为功能指向，转而以“增强个体能力”为合法性根基。制度的目标不再是告诉个体“你应该成为什么”，而是帮助个体实现“我能够成为什么”。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退场或集体的弱化，恰恰相反，它要求集体具备更精准的需求识别能力、更高效的资源供给能力、更灵活的规则调适能力，这是一种更高阶、更艰巨的集体能力建设。当代中国的“国家主导下的个体崛起”模式，其深层贡献正在于此：它不是在个体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再从头开始建构集体，而是在集体依然保持强大整合能力的条件下主动释放个体活力，并在个体活力充分涌流的基础上推动集体的功能转型与形态升级。

2.5. 超越“优绩主义陷阱”：自由的重负与集体的新使命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个体从传统单元中解放、获得自主选择权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的重负。当教育、职业、伴侣、信仰等人生重大节点均从“天命”变为“选择”，成功与失败的责任被完全置于个人肩上，一种新型的心理困境与价值危机随之浮现。社会学家所警示的“优绩主义陷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当社会过度信奉“你的一切取决于你的努力”时，它对结构性不公的敏感度会下降，对失败者的同情会匮乏，个体则在无限的责任重压下陷入焦虑、倦怠与自我怀疑。

这一困境对集体的新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未来的集体，无论是国家、社区还是各类新型共同体，其核心职能将从“资源分配者”拓展为“意义赋能者”。这意味着：集体不仅要保障个体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还要为个体应对自由的重负提供精神资源与意义工具箱。从存在主义哲学对“自由即责任”的深刻阐释，到斯多葛学派关于“控制二分法”的情绪调节智慧；从东方哲学“顺其自然”“缘起性空”对焦虑的消解，到社群主义在共同行动中确认价值的实践路径，人类数千年积累的思想遗产，需要被系统性地转化为普通公民可及、可学、可用的精神资源。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半年近千万人次的学习参与，正暗示着这种新型公共精神服务的巨大潜在需求。

更为根本的是，集体需要回应算法权力这一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在个体穿梭于多元选择性社群的同时，超级平台与政府部门通过掌握海量行为数据，正在形成一种比传统权力形式更无孔不入、更具预见性的新型控制能力。算法推荐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可能加剧信息茧房；社交评分在促进信任的同时可能异化为新型规训；精准预测在优化服务的同时可能侵蚀自主选择的空间。如何在技术赋能与技术控制之间划定伦理边界，如何在算法效率与个体自由之间寻求制度平衡，已成为集体必须承担的新使命。2024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开展的“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多家平台完成的算法备案与“茧房评估”“一键破茧”功能的开发上线，正是集体回应这一新使命的制度实践。

数字鸿沟 2.0：从接入差距到认知差距。 还需特别警惕的是，在个体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不平等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化。传统的数字鸿沟以“接入有无”为标志，通过基础设施普及已大幅收窄；而新一代数字鸿沟，可称之为“数字鸿沟 2.0”，正以认知能力断层为核心特征浮现。一项基于 31,779 名学生的全国性调查研究表明，城乡学生群体之间存在清晰的“数字梯度”：乡镇学生在数字素养、信息感知与创新潜能等维度上呈现系统性劣势，而“数字素养，信息感知”的认知中介路径解释了城乡创业意愿差距的 80%以上，以及创新能力差距的三分之一^[10]。这一发现具有深远的政策含义：

当个体越来越依赖数字工具进行学习、择业、创业与社会参与时，认知能力的的不平等将转化为发展机会的实质性不平等。这意味着，集体的公平使命必须从“接入普及”迈向“认知赋能”，不仅让每个人都能上网，更要让每个人都能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自身潜能。部分高水平大学通过完善的线下支持体系成功补偿学生数字素养短板的事实，恰恰证明：强有力的制度性集体支持，能够有效缓解个体能力差异带来的机会鸿沟。

3. 个体作为基本单元后的社会变革图景

当高度自主、深度互联的个体真正成为社会建构的基石，人类文明将迎来一场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彻底的重构。这场变革远不止于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意味着个人生存姿态、社会运行规则乃至人类共同命题的根本性演变。我们可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对未来图景进行一番系统的推演。

3.1. 个人的崛起：自由与责任的双重革命

于个人而言，这一转变是一场深刻的“赋权”与“赋能”。个体将告别工业时代“标准化人生”的流水线（求学，工作，退休），进入一个可自由定义、不断迭代的“流动生涯”。一个人可能同时是数字游民、学者和创业者，人生从攀登固定的社会阶梯变为探索多维的、个性化的生命景观。终身学习不再是一种口号或选择，而是内化为生存的必需，因为知识和技能的半衰期急剧缩短。

然而，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警示的，自由的重负随之而来。人生的每一个重大节点（教育、职业、伴侣、信仰）都从“天命”变为“选择”。这赋予了个体极大的自主权，但也将选择的全部责任和风险完全置于个人肩上。成功归于自身努力，失败亦可能被归咎于个人决策的失误或努力不足。这种“优绩主义的陷阱”可能导致巨大的心理压力、焦虑蔓延，以及社会同情心的减弱。当社会过度信奉“你的一切取决于你的努力”时，它对结构性不公的敏感度会下降，对失败者的同情会匮乏^[1]。因此，未来的心理健康体系与社会支持网络，需要应对的正是这种“选择自由”所带来的新型生命困境，其核心使命将从治疗“适应性障碍”转向纾解“存在性困境”，帮助人们在自由的旷野中，为自己建立精神的灯塔。

3.2. 意义的追寻：未来心理健康体系的哲学赋能

在高度流动、充满选择的时代，个体的心理危机将越来越多地源于意义感迷失、价值坐标模糊与自由带来的眩晕。未来的心理健康体系与社会支持

网络，因此必须超越传统的“治疗-康复”模式，转向一种赋能式的、支持个体进行意义建构的新范式。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系统性地整合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思想、哲学与精神资源，将其转化为普通人可及、可学的“人生操作系统”与“意义工具箱”。

存在主义哲学：拥抱自由的重量。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几乎是这个时代量身定制的解药。其核心，“人是被抛入自由的”，“存在先于本质”，直接回应了“优绩主义陷阱”下的责任重压^[12]。它教导我们：人生本无预设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才获得了为自己创造意义的绝对自由与责任。心理健康支持可以引导个体学习这些思想，将“无所依凭的焦虑”转化为“主动选择的勇气”，在每一个自主的决定中，定义属于自己的“英雄主义”。

斯多葛主义：修炼内心的韧性。在一个变化莫测、结果难料的世界，斯多葛学派的智慧（如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提供了强大的内心铠甲。它关于“关注你能控制的，接纳你不能控制的”的核心理念，是一种极佳的情绪与认知调节技术^[13]。未来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推广基于斯多葛主义的心理练习，帮助人们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韧，将挫折视为锻造品格的机会，而非个人价值的否定。

东方哲学：在联结中消解孤独。道家“顺其自然”的智慧、佛学“缘起性空”与“正念”的修行、儒家“修身”与“关系”的平衡，都为解决原子化的孤独感提供了宝贵资源。这些思想强调个体与更大整体（自然、宇宙、社群）的联结，引导人们从对“小我”的执着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脉络中安顿自身^[14]。通过研习与实践，个人可以学会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处，在纷繁变幻的世界里找到一种深刻的归属感与内在的和谐。

社群主义与实践哲学：在共同行动中确认价值。仅仅有内心修炼是不够的，意义必须在与他人的联结和共同实践中得以巩固。社群主义强调“共同体”对于构成个人身份的重要性^[15]。未来的社会支持应鼓励和资助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意愿共同体”开展具体的、利他的、创造性的项目（如社区营造、环保行动、知识共享）。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仅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更能通过切实的贡献，直观地感受到自身行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从而获得最扎实、最饱满的价值感与意义感。

制度化的实现路径是：将“哲学咨询”与“人文疗愈”纳入公共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在终身学习系统中设立“人文素养”模块，让公民可以便捷地

接触到这些思想资源；支持各类社群成为哲学思想的实践场域，让古老的智慧在鲜活的社会互动中焕发生机。

3.3. 社会的重构：从金字塔到动态网络

社会的组织逻辑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为集体塑造个体”彻底转向“为个体构建集体”。政府的核心职能从“控制者”与“管理者”转变为“平台架构师”和规则维护者。其工作重点不再是直接干预微观生活，而是为亿万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如便携式、不受职业绑定的福利账户，覆盖终身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和维护一个机会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传统社群功能将进一步减弱，基于强烈意愿（共同兴趣、价值观、目标）的“意愿共同体”将成为情感归属、社会协作和知识创新的主要单元。这些共同体生命周期灵活，形态松散，却能极快地动员全球成员的智力与资源，形成强大的行动力，成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如环保、公益、科研）的重要力量。例如，围绕一个开源软件项目或一个公民科学计划形成的全球性临时社群，其效率和创造力可能超越传统的科研机构。

建立于稳定长期雇佣关系之上的传统福利体系（如社保、医保）将面临重构压力，转向“全民基本服务”与“个人发展账户”的结合。社会通过强大的公共财政和科技能力，为所有成员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医疗和教育资源。同时，每个公民从出生起便拥有一个伴随终身的“发展账户”，账户中的资源（可能是货币、学分或数据权）可由公民在不同人生阶段自主决定用于教育、创业、育儿或养老等不同用途，从而将福利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规划”的工具。

3.4. 国家的转型：认同与职能的根本演化

民族国家面临其功能和合法性的深刻重构。当个体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多元化（一个人可能同时是某个全球性开源社区的成员、某个世界性宗教的信徒、某个城市的居民，最后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基于民族国家的传统认同可能会被部分淡化。国家的凝聚力将更多地来自其对先进理念的践行（如社会正义、生态可持续、科技创新）、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以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国家的核心任务不再是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是转向：

元规则制定者：专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底线，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伦理规范。

全球性挑战的协调者：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跨境疾病防控、数字治理等任何单一个体或社群都无法解决的议题上，代表其公民的利益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

最终社会安全网的提供者：为在激烈市场竞争和快速社会变迁中暂时失败的个体提供兜底保障，缓解系统性风险，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团结。

3.5. 人类共同命题的演变：旧题新解与新题降临

这一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形态与解决路径。

不平等问题：不平等将主要表现为认知能力、数字接入权、数据处理能力和个人品牌影响力的差距，即“数字鸿沟 2.0”。这比财富不平等更为隐秘和固化。解决的重点将从“财富再分配”部分转向“能力再赋能”，即通过改革教育、提供普惠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算力服务，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赋能性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全球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的逻辑也将改变。除了依赖进展缓慢的民族国家间谈判，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全球性“意愿共同体”（如国际性的技术开源社区、公民科学家网络、消费者行动联盟）将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创新技术解决方案、施加跨国舆论压力和监督各国履约情况，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算法权力的兴起：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形式正在兴起。为个体提供便捷服务的超级平台和政府本身，通过掌握每个人的海量行为数据，可能形成一种比传统暴力机关更无孔不入、更具预见性的权力形式，算法权力。它能够精准地预测、潜移默化地塑造甚至操纵个体的消费行为、政治观点和情感欲望，对个人自由构成深层威胁。如何监管和制衡这种非人格化的、嵌入代码的权力，将是未来政治与法律的核心议题。

4. 结语：在自由与归属之间——走向新的文明契约

这场从“给定的”单元到“选择的”单元的伟大变迁，既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文明迈向新阶段的动力。它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个体自由和人生可能性，也伴随着原子化、孤独感和意义缺失的风险。恩格斯的《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告诉我们，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漫长征程中的关键一环。

未来的挑战不在于如何阻止这一历史趋势，那无异于螳臂当车，而在于如何构建新型的社会契约和制度安排，既能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又能培育集体的归属与责任，最终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

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在现代性中，人们先是努力挣脱共同体，以获得自由。然后，他们又渴望有一个共同体，好让他们重新住进去” [16]。如何让这个“重新住进去”的共同体，既不剥夺个体历经千辛万苦才赢得的自由，又能提供温暖而坚实的归属，将是对人类政治智慧、制度创新和伦理境界的最大考验。

这或许正是社会主义理想在新时代最具生命力的呈现，它不是通过压抑个体来实现集体，而是通过彻底解放个体来重塑集体；不是退回到那个看似温情实则束缚的“必然”的过去，而是勇敢地创造一个在高度不确定性中，个体既能享有充分自由又能找到真实归属的“自由”的未来。我们正在书写的，正是这部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未完的史诗。

参考文献

- [1] 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 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3]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5] 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 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 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M]. 周逵, 刘菁荆,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6] 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7] 皮尤研究中心. 社交媒体的社区功能调查报告[R]. 华盛顿: 皮尤研究中心, 2022.
 - [8]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3年中国市场主体发展年度报告[R]. 北京: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2024.

[10] Xie, X.; Lu, C. Bridging the Digital Gradient: How Digital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Perception Shap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Urban, County and Township Students. Sustainability, 2025.

[11] 迈克尔·桑德尔. 优绩的暴政[J]. 哲学家杂志, 2020.

[12]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3] 马可·奥勒留. 沉思录[M]. 何怀宏,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45.

[14] 一行禅师. 佛陀之心: 佛法的本原教义[M]. 方怡蓉, 译.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

[15]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 追寻美德: 道德理论研究[M]. 宋继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6]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